

宿北战役：首次全歼国民党整编师

■戚苏源

宿北战役是1946年12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会师后发动的第一场大战役，在江苏省宿迁县（今江苏省宿迁市）以北地区围歼国民党整编第69师，师长戴之奇自戕，副师长饶少伟被俘。

统一指挥，密切协同。战役指挥支配战役行动，直接影响战役成败，只有各力量之间协调一致的行动和配合，才能形成合力，发挥整体优势。

宿北战役前，我军失利涸辙、失守淮阴，陈毅和粟裕等主要指挥员对两次失利进行深刻反思和总结，认为撤出两淮并非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对国民党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并且过去一段时间失利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形成统一指挥。

因此，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山野、华野合兵一处以便指挥的提议，建议集中山野、华野兵力攻下宿迁，进行宿北战役。中央军委经充分考虑同意粟裕的提议。同时，山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与华野司令员粟裕曾长期共事，关系融洽，当时部队中流传着一句话，叫作“陈不离粟，粟不离陈”，陈毅高瞻远瞩、掌握全局，粟裕多谋善断、敢打必胜，他们共同指挥战役充分保证指挥的正确性、科学性。

分析敌情，集中兵力。面对敌多路进攻，我军分析敌总体计划、编制、部署和指挥员素质等情况，综合我军部署情况，选择集中优势兵力打敌突出一路。

1946年11月，国民党军在占领苏中淮南、淮北地区后，企图尽快消灭华东解放军主力，或迫其北撤山东，迅速结束苏北战事。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25个半旅，分4路向盐城、阜宁、涟水、沐阳、新安镇（今新沂）和临沂进攻。我军主要指挥员分析敌情后认为，国民党军分4路进攻，正面宽达150公里，各部间隙较大，派系矛盾较多，且由宿迁进犯的一路未受打击，可能会大胆冒进，对苏北解放区威胁也最大，应当利用山野、华野主力恰好处在此路国民党军进攻方向两



宿北战役我军指挥所旧址“三仙洞”

侧，便于就近调动兵力的机会，果断对其进行打击。指挥员决定以部分兵力牵制其他3路，集中主力共24个团兵力，歼灭宿迁地区国民党军。

宿迁地区国民党军右翼为整编第11师，师长胡琏毕业于黄埔军校，作战经验丰富，与其作战必是一场苦战，且该师刚调到苏北，在不熟悉地形的情况下必十分谨慎。左翼整编第69师比较冒进，师长戴之奇是蒋介石心腹，但国民党军内部很多人对其不屑一顾。

综合各方面情况，粟裕提出作战方案：正面阻击第11师，把整编第69师分割出来，集中优势兵力两翼夹击歼灭整编第69师。

战法灵活，分割围歼。宿北战役中，

我军灵活运用多种战法，争取在运动中创造优势，歼灭敌人。

一是穿插分割、创造优势。面对国民党军多路进攻，我军采取穿插迂回战术，将其分割，然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将其各个歼灭。国民党军4路兵力扇形展开的全面攻势使其各部相隔甚远，为我军穿插分割提供便利条件。阻断来援敌整编第11师后，我军在包围整编第69师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穿插，将其各旅、团分割，逐个歼灭。

二是攻防结合、运动歼敌。经验表明，在装备处于劣势和缺乏攻坚战经验的情况下，歼敌于运动中，是取得战役战斗胜利的有效手段。在夺取制高点峰山的战斗中，我军一方面以部分兵力在正

面阻击、吸引敌人，另一方面集中主力从两翼实施钳形突击，迅速夺取峰山。

三是“围三阙一”、诱敌突围。合围敌人时，留一个缺口，使敌在逃跑与坚守间摇摆不定、斗志涣散，同时在逃跑必经之路上设伏，扩大战果，减少己方攻城带来的伤亡。在人和圩围歼战中，我山野2纵和华野9纵一部对敌实施包围时故意留出南面“缺口”，同时安排2纵4旅负责阻援。在追歼逃出敌残部时，我军于途中设伏，将其全部歼灭。

联系群众，支前有力。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宿北战役正是如此。

宿北战役中，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加强支前工作，华中局在1946年11月初成立“华中北线支前司令部”，谭震林任司令员，下设山东、苏北两个“支前后勤办事处”，统一调度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并将华中后方机关和物资逐渐向山东转移，战役期间先后动员41万余民工、民兵参加支前。宿北战役开始后，周边宿迁、新沂等县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支援前线的斗争，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粉碎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贡献力量，仅支援华野9纵的民工就有6000多人，担架1000多副，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参战支前的高昂情绪。

宿北战役，开创了解放战争初期全歼国民党整编师的范例，粉碎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苏北解放区的图谋，扭转了不利态势，逐步使我军由被动转入主动，巩固了苏北根据地；积累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提高我军运动战能力，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华东军民的胜利信心，对整个华东战场乃至全国战局都产生深远影响。

史说新语

微历史

总师欲驾机演示着陆

伊尔-28轰炸机是由苏联伊留申设计局研制的战术轰炸机，这型轰炸机刚刚装备苏联空军时，很多飞行员在着陆时会将操纵杆拉得过猛，导致机头翘起，机尾触地，甚至损坏机尾炮塔。

为此，苏军训练中心要求飞行员在机轮即将接触跑道时，稍稍压一下机头，避免机尾触地。有一名飞行员在着陆时过于紧张，压机头的动作太猛，导致前起落架在撞击地面后反弹，飞行员再次前推操纵杆，致使机头直接撞在跑道上，前起落架折断，机头领航员舱内的领航员丧生。

空军事故调查组和其他装备伊尔-28轰炸机国家的飞行员都认为，伊尔-28的起落架存在设计问题，着陆时一旦弹起易引发坠毁事故。不过，伊留申设计局的总设计师谢尔盖·伊留申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认为 是飞行员不知道如何正确着陆导致的。伊留申还放话说：“给我一架波利卡波夫双翼教练机，我给空军演示一下着陆应怎样应对弹起。”苏联空军一看设计局总师要亲自示范，赶紧派人劝阻并修改着陆操作规范。

夸大战绩的空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欧洲战场上，盟军占据绝对空中优势，沉重打击纳粹德国地面部队。美国报纸《陆军新闻》曾有夸张报道：“敌大规模攻势被粉碎，1000架‘台风’（英国研制的战斗机，二战期间多用于对地攻击）干掉135辆德国坦克！”据事后调查统计，这场战斗中只有5辆纳粹德军坦克被盟军战机发射的火箭弹击毁，另有1辆被航空炸弹炸毁。

这种夸大战绩的做法，并不鲜见。如美英飞行员曾经报告在3日内击毁77辆纳粹德军坦克，可能击毁另外43辆，但据战场调查，纳粹德军只有9辆坦克被战机击毁。

不过，这并不能否认空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一方面，盟军的空袭打击了纳粹德军后勤线，缺乏后勤保障的纳粹德军坦克战斗力随之下降。另一方面，空袭打乱了纳粹德军的进攻节奏和队形，为盟军地面部队组织防御争取了时间。

（张世鑫）



1941年生产的“能量巧克力”



美国好时公司开发的“热带巧克力”



现代生产的“能量巧克力”，巧克力已预先切割



二战时，美军配发的D口粮

“奢侈”与“抠门”

二战时美德军用巧克力开发思路之不同

■张远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激烈的战争，参战各国都为各自军队开发了多种军用食品，其中巧克力这种体积小、热量高的食品，受到很多参战国军队的注意。如美国和纳粹德国在战争期间都为各自军队专门制造和配发了各具特点的巧克力产品。

纳粹德国重视战场应急餐饮能力，战前就开发单兵应急口粮“铁口粮”，即以铁质罐头封装的熟制肉类和豆类。根据以往经验，纳粹德国军需部门注意到，可提供能量并鼓舞士气的零食，在战争中能发挥不亚于高质量主食的作用。

相应产物就是“Scho-Ka-Kola”（能量巧克力）。“能量巧克力”，其德语名称是原料中3种主要成分可可豆、咖啡粉和可乐乐的缩写。这种巧克力在上世纪30年代由柏林希尔德布兰德可可和巧克力工厂开发，最初想借柏林奥运会的风头，以“健康”和“能量”之名占领日益发展起来的甜食消费市场。富含咖啡因的“能量巧克力”被认为具有提神醒脑的作用，适合运动员或需要保持旺盛精力的人员。

与“能量巧克力”这个名称同样著名的是其圆形铁盒包装。现代生产的“能

量巧克力”仍采用相同的圆形铁盒，只是盒内巧克力已预先切割为上下两层共16块。铁盒涂装采用古典放射性图案，红白搭配，很符合那时德国人追求规律和几何感的审美情趣。

提神又能提供高热量，“能量巧克力”正巧满足纳粹德军对应急食品的需要。二战临近时，“能量巧克力”被纳粹德军选为军用食品，首先装备对应急食品品质和重量有要求的空军部队。因在纳粹德国空军广受欢迎，“能量巧克力”也获得“飞行员巧克力”的别号。

此后，纳粹德军开始将其配备给其他军种，优先获得这种在战争时期难能可贵“奢侈品”的，除空军飞行员外，还有潜艇兵和空降兵，陆军部队想要获得足够数量的“能量巧克力”始终是奢望。希尔德布兰德工厂在战争爆发后，再未向民间市场出售过巧克力产品，“能量巧克力”成为一种纯粹的“军粮”。

与追求军用巧克力品质和提神效果的纳粹德国不同，美国的军用巧克力开发走的是一条更加实用和功利的路线。

二战中美军单兵口粮主要有C口粮、D口粮和K口粮等，都是包装好的成套食品组合，以便让士兵在战场上缺乏

烹饪条件时自行食用。这其中最“简陋”的是D口粮，其实就是巧克力棒。

D口粮在研发伊始，就确定其“应急口粮”的定位，追求高热量、易保存和口味差。追求“口味差”，似乎有悖食品生产的常识，但在战场上有重要意义。“比水煮土豆略好吃一点”的味道，让士兵不会在非必要情况下，仅仅因为“嘴馋”而过早消耗掉宝贵的救命口粮。

另外，为克服巧克力在高温环境下易融化的缺点，D口粮的开发商好时公司还开发了专门配发热带战场的“热带巧克力”，这种掺杂大量燕麦粉、玉米粉，减少蔗糖，增加维生素含量的巧克力，在口感上甚至比D口粮更差，但在高温环境下不易融化，方便保存。

可见，纳粹德国在应急口粮方面走的“高端”路线如同其装备的武器一样，性能上虽有一定先进性，但在经济性上存在缺陷，很难大批量装备部队，反倒是“抠门”的美国，满足了部队对应急口粮的需求。

链接历史

原典

《百战奇略》退战篇原文为：凡与敌战，若敌众我寡，地形不利，力不可争，当急退以避之，可以全军。法（《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左传·宣公十二年》）曰：“知难而退。”

退战篇认为，凡对敌作战，若敌众我寡，且地形条件对我不利，在仅凭兵力无法与敌争胜的态势下，应立即撤退以避免敌方，这样就可保全我军。诚如古代兵法所说：“作战中知道我方难以战胜敌方时，应及时撤退保存实力。”

战例

公元244年，魏国大将曹爽奉命率军讨伐蜀国，司马昭随同前往。魏军穿过骆谷（今陕西省周至县西南）后，进至兴势（今陕西省洋县北）。蜀将王平率军趁夜偷袭魏军，司马昭命所属部队固守营垒不战，王平退回。司马昭对诸将说，蜀将费祭必凭险据守，我军前进得不到交战机会，强攻硬打又不可能奏效，应急速撤军，再作打算。曹爽听后率兵撤退。费祭果然率军抢占沈岭、衙岭、分水岭（三岭皆在骆谷内）等险要地形截击，曹爽等率军偷偷越过险阻地带，安全撤回。

1947年3月13日拂晓，胡宗南指挥14万人，兵分两路进攻延安。毛泽东同志从战略全局出发，做出中共中央机关和部队主动撤离延安的决策。“西北王”胡宗南大军奔袭，得到的仅是延安一座空城。虽然其大肆宣称共军“不堪一击”“仓皇北窜”，实际上却因占领延安无暇分兵，彻底被拖在陕北，大大减轻我军在其他战场的压力。随后，彭德怀指挥我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青化砭、洋马河、蟠龙镇和沙家店4次大捷，重创胡宗南部。1948年4月21日，延安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计谋分析

合理保存有生力量。所谓“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无论何种战斗，常胜不败的“善战者”是没有的，而在人数、兵器不占优势的前提下，以寡敌众，逞匹夫之勇，强攻硬拼显然不是优秀战争指挥员的明智选择。能够稳住败局，使己方部队不至于因混乱而一发不可收拾，最大限度保存实力以利再战，才是优秀指挥员应具备的能力，也是取胜的根本前提。摆脱困境、保存有生力量最好的办法就是“退”，“退”并非怯懦的表现，也不是不得已时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通过主动退却进行战略转移，为将来东山再起保留资本。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存实力、韬光养晦，才有重振雄风的可能。正因如此，《三十六计》最后一计即为“走为上”。所谓“走为上”，并非说“走”就是最高明的上乘计策，而是指在敌我力量悬殊的不利形势下，采取有计划的主动撤退，避开强敌，然后再寻机歼敌。曹爽攻蜀之战，数十万魏军陷入进退两难的不利境地，正是由于及时后撤，才避免全军覆没。面对胡宗南装备有坦克、飞机的数十万大军，我军只有2.5万余人，且弹药奇缺、装备落后，死守延安无异于以卵击石，只有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先行放弃延安，再乘机收复失地才是最佳选择。

正确使用“退”的方式。退却是一门高超的指挥艺术，这种指挥艺术的重要性和难度不低於进攻和防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退却方一般都处于不利境地，如伤亡严重、保障困难、士气低落等，而敌方则处于优势地位，风头正劲。在这种情况下，退战决

策者能否找准摆脱困境的退路，变被动为主动，直接关系己方生死存亡。因此，所谓“退”，并不是一窝蜂地乱跑，更不是消极逃跑，而是有计划地主动退却。“退”说来容易做则难。难就难在，它既受思想因素影响，也有实际问题需解决。既要从大局着眼、胸怀广阔，不怕蒙受损失，不怕丢面子；更要有智慧，何时“退”，如何“退”，“退”向哪里，都需要高超指挥才能。因此，退战取胜的关键，就是要正确掌握“退”的技巧，要通过巧妙牵制、疲惫和迷惑敌方，达到全身而退的根本目的，甚至能够利用“退”来分散、疲敌以创造战机“破敌”，这是退战最高境界。毛泽东同志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西北野战军得以轻装上阵，打起仗来更加主动灵活、游刃有余。相反，胡宗南却因占领延安背上沉重包袱，包袱越重越走不动，反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大量精锐力量被消灭。

充分把握退战分寸。退战，尽管在战争实践中运用比较普遍，但其在军事行动中终究属于一种奇计，本身并不符合战争根本目的，战争的目的是争胜逐利，撤退只是一种将逐利寄希望于未来的不得已做法。倘若片面强调“退”，会造成喧宾夺主的结果，甚至导致军心涣散、“兵败如山倒”的惨败局面。因此，必须客观理解和把握退战的火候和分寸，明白退战所要求的“退”绝不是消极避战，而是为了进的“退”，甚至是为了“进”而进行的主动撤退，从而通过诱敌和调动敌方制造战机。由此可见，避免决战、诱进分敌、变换环境、拖垮敌方、以退为进才是退战的灵魂。



胡宗南部占领后的延安，只是一座空城